

美·尼·總·塔  
那·蘇·民·總·塔

著  
林·生

# 《小思巴字蒙古語碑銘》 釋 补

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41.53/

8/3

# 《川思巴字蒙古语碑铭》 译 补

[美]尼·鲍·培 原著

郝苏民 翻译 补注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6 满拉尔

49833

本书根据西德威斯巴登出版的  
一九五七年英文版本翻译出版。

##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

[美]尼·鲍培 原著  
郝苏民 翻译 补注  
乌恩奇 审校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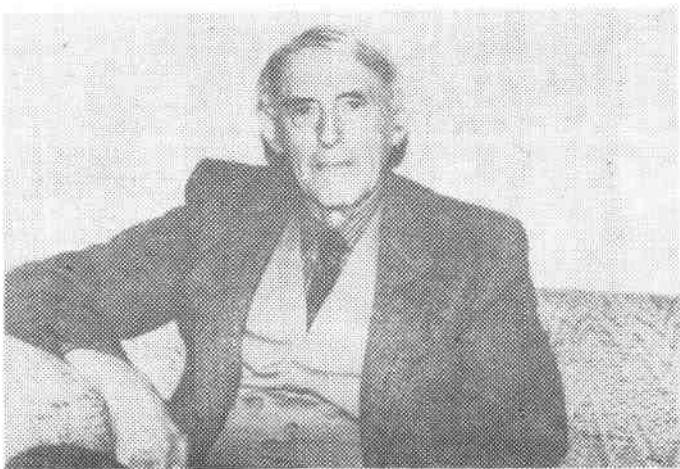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呼伦贝尔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897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统一书号: 9298.1 定价: 平装8.00元  
精装4.00元



鲍培先生近照  
(摄于美国西雅图)

## PREFACE

My book on the Mongolian ᠮᠻᠡᠳᠷᠾ Script was first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Russian. It was ready for publication in 1937 but appeared only in summer 1941, a few weeks after the German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fore, it was available to very few scholars outside of the USSR. That Russian edition of my work was based on materials published by Pozdneev, Roland Bonaparte and Chavannes, and the bibliography appended to my book contains only the titles of works which had appeared befor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ook.

When I settled d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9, I decided to take my book accessible to the scholars outside the Soviet Union, and an English edition was prepared by my then student John Krueger, later

Yours sincerely,  
Nicholas Poppe  
Nicholas Pop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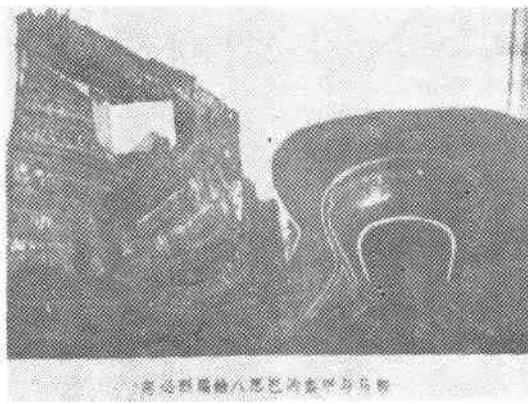
in

Nicholas Poppe  
transcribed the  
Mongolian has no glottal  
therefore,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syll

作者手迹  
(为中文版所作序言原件)



元世祖忽必烈与八思巴  
(西藏扎什伦布寺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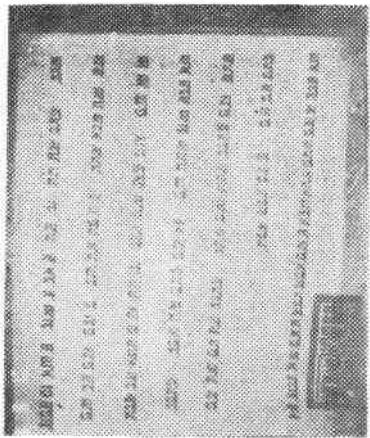
忽必烈给八思巴的盔甲与马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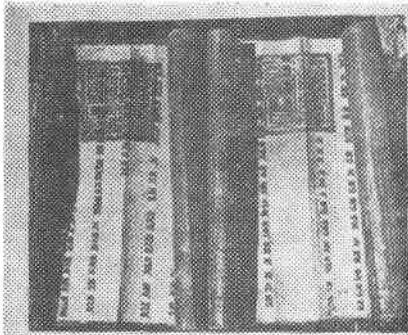
甘肃拉卜楞寺八思巴鎏金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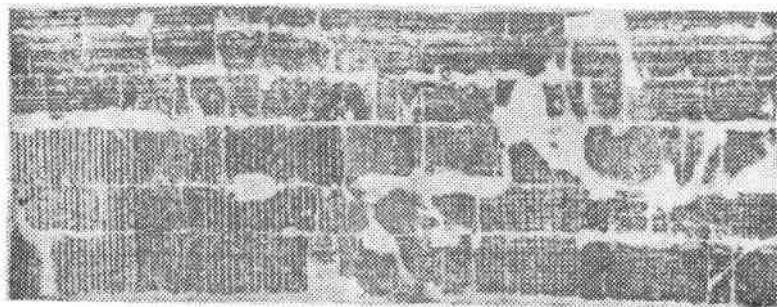
西藏白居寺五祖之一八思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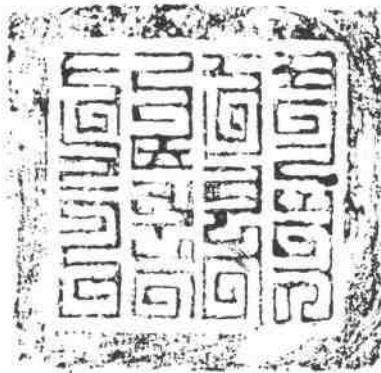
元代颁于西藏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件片断



元代颁于西藏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件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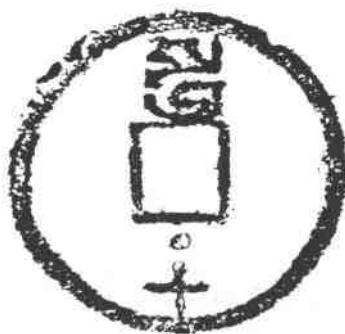
居庸关西壁六体石刻



甘肃发现的1372年（宣光  
二年）《中书右司都事所》印



元币“大元通宝”  
(正面)



正面



背面

元币“至正通宝”



一一一四、德善應儲祥尚業旨碑

## 前记

—

N·N·鮑培先生所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的中文翻译补注本，在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四十周年的大好日子和作者九十高龄之际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初版以俄文写成，名为《方体字（蒙古文字史·第一卷）》（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67页，插图22幅，1941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之后于1955年，由村山七郎、山崎忠二人节译成日文发表。1957年，在作者亲自指导、检校下，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约翰·格鲁格尔增订并译为英文，算作第二版，书名为《八思巴字 蒙古语 碑铭》（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 AGS—PA SCRIPT, JOHN R·KRUEGER, 147页，插图22幅，哥丁根亚洲研究第八种，威斯巴登）。

我们的中文版，先根据俄文原版译定，又据英文版校核。

关于这本书在蒙古学学界的地位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耐思和民族研究所所长照那斯图合写的文章中曾评述说：“差不多跟龙果夫同一个时期，波普（即鮑培，下同）教授发表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这本书是八思巴字研究的代表作，对八思巴字本身的体系，第一次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说明，对于人们学习、了解、研究八思巴字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参考书。如果说当时在拼写汉语资料方面八思巴字研究水平的代表是龙果夫，那么在拼写蒙古语资料方面八思巴字研究水平的代表则是波普，他们共同为以后的八思巴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世纪内，八思巴字学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写蒙古语的八思巴字

研究和探讨古代蒙古语的问题方面，则没有多少进展，一般来说，仍然停留在波普的水平上。”（见《民族语文》1981年1月号“八思巴字研究概述”）应该说，从语言研究的总角度上讲，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正的。除此之外，鲍培先生的这本书，我以为在蒙古语言学史、蒙古文字学史的研究进程中，也在蒙古学的发展史上，都不失为蒙古学学术群星中煊目的一颗，纵然在个别具体方面，本书难免也有些许不确之处。我们译补、出版这本专著的动机之一，正是出于对它的这种理解。

## 二

1983年，日本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教授，在与我进行学术交往中，得知了我从俄文版上翻译了鲍培先生著作的情况，桥本君不仅给了我友好的勉励和支持，同时回国后又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在美国的鲍培教授。使人感动的是，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鲍培先生，又带着严重的眼疾，却给我热情写信，并亲自为这个汉译本打字作序，信中诚挚地提出据俄译的书稿务必校对英文新版，尤其是文献目录和词汇表两个部分的希望。在我无法得到一本英文原作时，仍是桥本君及时地从东京为我寄来了复印本、鲍培老人的近照，并多次来信关心这一工作。正是由于学术界的国外友好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和对共同科学事业的忠贞以求，也靠国内诸多学长和有关方面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才使我在资料、信息条件十分不足的处境中，不揣谫陋，把这点保存、传递民族文化的心愿变成可能。为尊重鲍培教授的意见，虽然我的英文水平等于零，靠着友好们的帮助和自己的专业知识，终日矻矻，竟免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这其中西北师院外语系副教授薛守邦、张儒林，甘肃教育学院副教授朱文昌，在帮助正确理解俄文原作，对部分英文章节的校核上，都付出了劳动；尤其是我院李

国香教授，他的阿尔泰语言学方面的丰富知识和多种外语、民族语才能，他对这一工作所给予的具体帮助，都成为我校核两种版本得以完成译稿的保证之一。他还直接笔译了鲍培先生为中文版所寄来的序言。以上这些友好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和扶掖他人的品德，理所当然地应书之于此，铭记于心。

还必须一提的是，我国著名蒙、元史学家，我国当代八思巴文的学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教授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来信鼓励说翻译这本书是“有功士林”，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蒙古文字学家包祥教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我所在单位的有关同事们的协助。凡此，都成为我完成任务的动力。他们这种奖掖后进、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当然，这本书最终得以问世，最主要的是与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内蒙古和甘肃省的古籍整理办公室的各位领导人，中国蒙古语学会的同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负责人、责编同志们的赞助，对民族文化、学术的高度责任感分不开的。没有这些帮助，这样一本字型繁杂、制版困难，涉及多种技术的著作，是不能成书的。对这些方面的各位负责同志和付出劳动的工作人员，我表示衷心的敬意。

### 三

关于本书的体例与技术方面，需作如下交待：

(1) 由于我将原著当作八思巴文字学的入门书来介绍的，故对讲解、叙述性的部分，不在刻意逐字求“忠”，而在顺言达意，易于理解，取其意义上的“信”。除英文版中已增补、删削的部分一概从之外，在表达同一意思的句子上，无论俄、英，哪种表达更为我国读者易于理解，则依那种说法，时有溶二种说法为一的情形，所以实为“译述”。这种方法在忠实传达原作者观点

的前提下，是鮑培先生主张和身体力行的方法。

(2) 作者在本书中实用两套转写符号：一为移写符号(Transliteration)，代替八思巴字字形本身；二为读音符号(Transcription)，只用于对碑铭文字实际发音的标音。因为出于对蒙古语八思巴字初学者和蒙古学青年工作者实用方便计，我在中文版中恢复了八思巴字本身，这样便删去了作者为它设计的“替身”一移写符号。同时，也是出于上述考虑，对讲述部分中的例词、每一种碑铭正文，除增补八思巴字本身外，又增补了我国现行的回鹘式蒙文的转写，以资对照。在汉译上，除用当代汉语普通话外，凡元代、或史籍上已有译名者，则一律从古，旨在有助于从事史学的读者，了解一点元史、蒙古史籍中那类所谓“元代白话”的硬译词语和文体，所以对碑铭中凡有元代汉译的，即I、II、III、IV、VI号诸碑文，均增原文附在每一碑铭的今译之后。

(3) 原著中碑铭的图版，不是随文排订的，中文版为方便于读者，调整了排列顺序，即每一件碑铭，都依这样的次序：原碑铭图版、八思巴字照录、拉丁字的读音转写、我国现行蒙文转写、汉译(今译或附原译)。

(4) “对原文及译文的评注”，代表了鮑培先生的研究和学术观点，为便于读者查阅原文，所以注释序码的标排一律从旧，即中文版这一部分的注号，与英文版的注号是完全一致的。译文也依英文新版重译。

(5) “词汇表”、“文献目录”主要据英文版翻译。

(6)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地图”是依照英文版原图复制翻译的，未加任何改变。

(7) 中文版中，我们又增加了几种附录，也补充了必要的插图，在目录中都已一一标明。

(8) 英文本中原有的图版均照原样复制，唯VI、VII号铭文图版，因原图模糊不清，难以制版，即采用了玉耳英文原版的《马

可·李罗游记》(Travels of Marco Polo. Yule London, 1903)中的金色图版。但牌面铭文则从鲍培英文原著。

(9)人名等专名第一次出现时都附原文。

## 四

五十年代初期在大学专攻蒙古语文时，我甚至不曾在课堂教学中听说过“八思巴字”这样的名称，只是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从我国学者蔡美彪、罗常培诸先生的著作开始，才对八思巴字有了点滴所知。六十年代初在安木多藏区喇嘛寺院所见以装饰为目的或印章所刻八思巴字，引起我钻研此道的兴趣，而津梁是偶然得到的一本鲍培教授本著作的翻印本。我靠了这本书，度过了在高原牧区专职体力劳动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时日，通过它我不仅初学俄文和促进了藏语的学习，也走进了一个完全迷人的历史语言的天地。十年动乱，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被毁于一旦，目有所睹，除扼腕三叹而无可奈何！

四十年代前，作为一位外国学者，鲍培教授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能以高度的热情、惊人的毅力和科学态度，广览博稽；对残篇散佚，扒梳抉剔，详加考证，作了开创性的归纳研究，写出了专著。而我们做为祖国这笔文化财富的合法继承者们，到了六、七十年代却不能充当她的保卫者，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从我的大学生活想到今日大学生、研究生们的需求，也从祖国各民族间一脉相承的友好关系和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的史实出发，我有了译介鲍培先生著作的心愿。初稿的片断，是在我生涯中的艰难之时零星搞起来的，实为自学择译的札记。认真干，仅是在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第二次获得解放之后的事情。终因时不待人，我已到知天命之年，以个人才力本是不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凭就凭了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点感情和由此而产生的一点毅力。当然最终还是要

感谢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好时代和上述诸方面的领导、学界友好的鼓励和支持！但个人出于才疏学浅而有曲解原著者，是不能逃脱责任的。对此，我要就教于海内外诸学术贤达，企能不吝赐教，这将是我十分感激的！

鲍培先生在为我们的中文版专写的序言中曾说：“中国是八思巴字产生的地方，那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献（包括八思巴字写成的）。中国学者，当然会极好地组织起来，深入研究那些材料。在结束这篇短序前，我愿表示深深的信念，有了中国同行的积极协助，蒙古学研究，定能取得最好的成果。”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今日的情况正如鲍培教授所表示的信念那样，近年来我国蒙古学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研究方面，情景是十分鼓舞人心的，既有珍贵文献的不断发现，又有具体的突破性认识，有关学术著作也在相继问世。我的这部不成功的译补本，就权作我国青年蒙古学者们的急就之用吧。

郝苏民

1986.2 兰州西北民族研究所

## 鲍培为中文版所作序言

我的论蒙古语八思巴字的书，先以俄文写成，原拟1937年发表，但迟到1941年夏德国侵略苏联前几周才出版。这一来，苏联以外的学者得到了它的人，仅有不多的几个。俄文版是根据波兹德涅耶夫（А.Позднєев）罗兰·波拿巴特（R.Bonaparte）和沙畹（F.Chvannes）已发表的材料写成的，附在书后的文献书目，也只是收编前仅有的一些书名。

1949年我定居美国之后，决定要让苏联以外的学者也能得到该书。因之，当时我的学生、而日后成为印地安纳大学教授的约翰·克鲁格尔（John Krueger）搞了英译。我逐字检校过译文，期于意义不受歪曲或出现别的纰漏。那个本子于1957年发行。它跟俄文的本子不大一样，因为有了一些小的更改。首先，加进了海涅士（Haenisch）发表的碑铭里的单字，词汇量扩充了。其次，某些词组译得更精确了。最后，增添了1937—1957年之间新问世的书名，参考文献就更趋完备了。

八思巴字是元朝开国元勋忽必烈皇帝推行的。不论我们如何估价外族朝代，也不论我们对待帝王和朝代持什么态度，我们却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即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只是在元代，才开始日趋统一。1368年元朝虽然覆灭，但是统一却持续下来了。

根据藏文创制八思巴字，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套字母，比回鹘字母优越。回鹘字母缺乏许多音位符号，既不适合突厥语，也不适合蒙古语。新的八思巴字相当理想，如果十四世纪和之后的政治形势平静，完全可以取代回鹘字。新字的创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壮举，原想让它成为转写元代所有语言（包括汉语）的文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八思巴字完全不适于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汉语）的转写。汉语的音位、音韵太复杂，八思巴字实在应付不